

点。当时台湾把这理论译为“永续发展理论”，我们研究认为不妥，改译为“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个名称为全国所接受。这本书是我和助手李千共同写的，社科院郑玉歆也参加了。

第二本书是我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郑玉歆合写，他也是清华毕业生。这本书完全是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写的，而且反映了中国的情况和观点。当年获得国家图书奖。

第三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出一套生命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本是讲可持续

发展的，他们约我编写。我约了日本金泽工业大学校长金田一郎、一位奥地利专家和一位香港专家共同编写。这本书完全是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写的，因为教科文组织成员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很顺利通过。后来在约翰内斯堡开的国际首脑会上，还专门把我写的结论部分抽出来印成专门文件发给各国首脑。

现在，“可持续发展”方针已成为我国重要国策，成为联合国的共识，内涵也大大丰富和扩展。我在社科院总算作了引进、推广的工作。

清华校训砥砺我前行

○戈 泊（1946—1948 土木）



戈泊学长与夫人，二零一八年

在清华近110年的历史中，抗战八年期间是在大后方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是清华校史中光辉的一页。我，原名顾骅，于1946年抗战胜利后清华在北京复校后的第一次招生时，以同等学力考入了土木工程学系，又

于1948年9月通过中共城工部进入了华北解放区，在清华只呆了短短的两年。当时我只有16岁，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还不甚了了，但我有幸于1940年至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附小和附中上了六年学，深受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和校风的影响。

在西南联大附中和清华的学习生活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附中是昆明的顶尖中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教育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崇尚通才教育。校长是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先生，各门课程都聘请名师执教，例如学术精湛的任继愈先生曾教过我们年级的国文，杨振宁先生（当时还是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曾教过我们数学，等等。联大附中还鼓励学生自由

□ 回忆录

发展，不仅追求高超的教学质量，还开设了音乐、劳作、体育等课程，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劳动习惯、动手能力和集体配合的精神。虽然学校对教学要求很严，但我还是有时间阅读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并养成了对歌咏和古典音乐的爱好。

1946年进入清华以后真是眼前一亮，过去我经常到西南联大去，看到的都是草房茅舍，现在映入眼帘的都是一栋栋红砖砌就的洋房，真个是天上地下。但是正如梅贻琦校长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也感同身受。清华教授们上课与中学迥然不同，无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授课都是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没有照本宣科的。叶企孙教授给我们上“普通物理”，戴世光教授给我们上“经济学简要”都是谆谆教导、诲人不倦。马约翰教授给我们上体育课，教给我们怎样健身强体，十冬腊月他还穿着短裤，光着头，真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使我逐步体会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含义，那就是无论做学问或为人处世都必须砥砺奋进、奋发图强，力求进步、永不停息。特别是像自己这样一个资质平平的人，更必须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厚德载物”就是为人要坦诚，胸怀要宽广，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可是，好景不长，国共内战风起云涌。1946年底发生了北大女生沈崇在东单广场被美军强奸的案件，地下党在各高校组织了罢课游行，我由于少年时代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自然积极参加。1947年内战愈演愈烈，学生运动接连不断，这年“五二〇”左右，北平全市大中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罢课大游行，清华学生

也经常进城游行。我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罢课游行的积极参加者。除此以外，我还参加“大家唱”合唱团，排练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以及《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哟好地方》等革命歌曲，经常到校内外演唱。1947年7月，我被吸收参加了中共南系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自此算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共地下党员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在清华全校学生及教职员中已占有很大比重，为了避免敌人大肆搜捕，并为解放南方蓄积力量，党派遣大量党团员南下，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我因为家在上海，也被派遣回家。由于我从小生长在昆明，不通上海话，年龄又小，找职业有困难，家长又不同意弃学就业，只好“离家出走”，重新回到北平。经地下党同学李开鼎介绍，通过封锁线，我到达华北解放区，经城工部派遣，去了正定华北大学学习和工作。当时济南战役已经结束，辽沈战役已经打响，由于工作积极，我于1949年1月10日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生涯

1949年初刘少奇秘密访苏，请斯大林派遣六十名苏联专家协助中国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政治经济干部。刘归国后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为基础，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我随华北大学并入了人大，并参加了人大的筹建工作。

招生任务完毕后，人民大学挑选了一批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跟随苏联专家学习。我被分配到计划统计系工业统计教研

室。由于中国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计划经济，当然这个系是很重要的。当时苏联专家廖佐夫已经到校，计划统计系招收的本科和专修科学生也都到校，本科学生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熟练工人，专修科的学生都是在职干部。当时我国原有的大专院校中都没有开设有关计划经济的课程，更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和教材，一切都得依靠苏联专家。而计划统计系只有一位苏联专家，只好由我们这批年轻的大学生赶鸭子上架，跟着苏联专家边学边教，采取现买现卖的办法，勉为其难了。

其他大专院校为了适应新形势，也派了一些教师来人民大学学习苏联式的统计学，于是我们还开设了研究生班。这时我刚满20岁，除了自己学习，还要承担本科、专修科和研究生班等不同类型的教学任务。各类学员的年龄都比我大，真是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了备课，每天半夜一点以前都睡不着觉。这时清华校训“自强不息”激励了我，在重压之下，我奋力拼搏，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953年我被任命为人大工业统计教研室的副主任（主持工作），我们这个团结奋斗的集体，不仅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还与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工业普查和其他调查研究活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能联系中国实际进行讲解，初步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还参照苏联沙文斯基教授编著的《工业统计学教程》，联系中国实际，编写了一部《工业统计学》，这部教材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科学研究二等奖。为了奖励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果，我被评为“青

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参加了中共北京市的党代表大会。

1954年我被评为讲师，1956年国务院高等教育部评选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批教授、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也有二十多人，计划统计系评上了两名副教授，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26岁，算是新评上的副教授中最年轻的。实行工资制时，我被评为高教六级，也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

在苏联当研究生的体验

1956年，人民大学派了六名教师去苏联进修两年，我被派到国立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现名国立莫斯科经济统计信息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交恶，掀起了反对崇美媚美的高潮，各大中学都取消了英语课，改学俄语。我作为人民大学的教师，当然得改学俄语。当时盛行俄语速成法，学者裁了许多小纸条，一边写一个俄语单词，另一边写上对应的中文单词，每天都要生记硬背十几个单词。当然凭这点俄语知识要去苏联进修远远不够。于是我在行前每天骑车从人大到设在北京外语学院的留苏预备部，跟随一个班学习口语。但是，到苏联以后，在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中还是不能应付，后来在俄语教师和同房间苏联同学的帮助下，才逐步适应了。

我在国内虽然已被评为副教授，但当时只有26岁，本着清华校训“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了奋发图强、积极向上，我决定改为攻读研究生。经人大领导批准，从两年制的进修教师改为四年制的研究生。

苏联的研究生制度是学习德国的洪堡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精雕细刻，重在扩大研究生广博的知识面，培养他们

□ 回忆录

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无论学习什么课程，都不要你听课，而是指定一大堆参考书让你去阅读，进行综合梳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定期和导师讨论。这种培养方式与清华梅贻琦校长提出的“尊重学术自由、尊重思想独立”的见解不谋而合。在这种培养方式下，我通读了《资本论》等许多俄文马列原著，许多经济学、统计学的书籍和论文，甚至阅读了不少沙俄时代的统计学著作。到学习后期的编写论文阶段，我每天一早就跑到莫斯科市中心的列宁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中午喝杯咖啡，吃点面包，直到闭馆时才回到宿舍。

苏联的研究生培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我的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其结果是，我用三年半时间完成了研究生学习，最后能够“兼容并蓄”，用俄文写成了一百多万字的毕业论文，于1959年5月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并受到评委会委员们的好评，被授予经济学副博士学位（注：苏联的学位授予制度非常严格，在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两位在国内已有较高学术造诣的自然科学学者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历练

1980年底，我从北京市委被调到国务院新成立的中国专利局担任负责人，当时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同意中国派一名官员去该组织担任“高级顾问”，专利局领导决定派我前去任职。那时我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到10年，很少有人到国际组织中去任职。当时我已经是51岁的半大老头子了，英语还是三十多年前在西南联大附

中和清华打下的一点基础，现在要只身去资本主义国家工作，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去日内瓦赴任，能不能应付局面？心中不禁有些嘀咕。我决定临时抱佛脚，参加了北京市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一个英语口语译加速班。班上的同学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我又运用二十多年前在北外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的经验，不怕丢人，在班上抢先发言，练习英语的听说能力，我的积极态度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到以后，明显地感到语言方面的差距，因为在这里从领导到同事都是外国人，日常交谈、读写文件、开会都得用英语，我那点英语水平相形见绌。好在联合国各组织都鼓励职员学习外语，办了许多免费的学习班，我每天利用上班时间可以参加一个小时的学习，从英语二级学到英语五级（最高级），根据个人能力经过考核随时可以晋级。我和过去一样，经过勤学苦练，顺利地学完了全部课程。加之平时主动和同事们交流沟通，听、说、读、写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阅读和起草文件的能力，听会和会议发言都渐入佳境。

从1981年到1984年，我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工作了四年，当时该组织的创始人和总干事是美籍匈牙利人鲍格胥博士，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强势领导人，很希望能促进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建立起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我去以后，他们很重视，鲍格胥博士安排我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但是，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和“文革”的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思想中还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即便有一些知识，那也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如果有什么发明创造，应该由

全社会无偿地使用。专利制度要给予发明创造者以长期垄断的独占使用权，那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相容的。在计划经济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下，中国人一般都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特别是听到“专利”二字，更觉得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思想。当专利局把起草的专利法草稿提请社会各部门讨论时，遭到一些主流部门的普遍质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我国所有的工业产品和科技产品都是模仿国外的，如果建立了专利制度，国外的发明创造大举进入中国申请专利，那就会堵塞了我们模仿的门路，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脚。能否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三年多；反对的声浪占上风时，影响了WIPO官员的情绪，我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中国专利法草案先后修改了23次，每个修改草案及其实施细则都会送到WIPO来征求意见。鲍格胥必定召集法律顾问、工业产权司司长和我在一起，逐条逐句地仔细分析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中方。关于是否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争论，最后经过邓小平同志的拍板才算尘埃落定，有了肯定的结论。直至1984年3月12日，专利法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身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个大环境中，耳濡目染，对中国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必要性还是坚信不疑的，对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顺利通过，也算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在此期间，我还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等国际条约的作用、意义和参加的必要性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调研报告，报送给国内有关部

门，对我国参加这些国际条约，起了一点参考价值。

参与创建中国的专利制度

1984年底，我结束了与WIPO的工作合同，奉召回国。1985年初，被任命为中国专利局副局长和党组成员。专利局成立后的前四年，中心工作主要是起草和修改专利法草案，局的业务建设还在筹备过程中。对于建设一个新型的、业务性很强的现代化专利局，大家都很陌生，只能参照国外的经验，一切从头开始。

1985年3月12日，专利法正式生效，也就是专利局正式开张接受专利申请的日子。局党组定的目标是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顺利地接受专利申请，争取当年通过专利审查，授予第一批专利权。WIPO总干事认为能实现这个目标将是一个奇迹，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局长黄坤益做事很果断，但作风比较民主，充分放手让几位副局长管好他们各自分管的工作。

3月12日清晨，许多申请人就到专利局排队领取申请表格，第一天就提交了四千多份专利申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局职工的共同努力，大家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终于胜利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于1985年底以前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授予了第一批专利权，创造了世界专利史上的一个奇迹。

当时局党组分工，让我分管法律、国际合作、文献、出版、宣传、自动化等业务，并担任中国专利局的新闻发言人，除了审查业务以外，其他业务工作都压在我身上。这些业务对我来讲都是生疏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在清华“自强不息”校训的激励下，本着学习的态度，我勤勤恳

□ 回忆录

息，奋发图强，到每一个部门去，依靠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在所有的会议上，我聚精会神地听取每位同志的发言，开动脑筋，认真思索，所以很快就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较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专利文献是专利审查制度的必要工具和基石，每年各国专利局都会公布成百万份的专利文献，专利审查员必须检索浩如烟海的专利文献，才能确定一项发明创造是否属于全世界首创，是否有资格授予专利权。我在WIPO任职期间，就去了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专利局，请他们将多年来积累的专利文献纸件的备份支援中国专利局，装了三大集装箱，为我国的专利审查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回到专利局以后，又与一些主要国家的专利局建立了专利文献的互换关系，使专利审查工作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专利局从建局伊始就很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德国专利局援助我们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拥有先进的黑白和彩色印刷设备，从一开始就可以自行印制全部专利文献、有关的杂志和书籍。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向媒体通报专利工作的进展情况。每年年底还编印中英文对照的彩色中国专利局年报，向国内外汇报中国专利的发展状况、年内的大事以及重要的统计资料。我们还编印了中国专利局的机关刊物《中国专利》月刊，1987年左右又扩大为《中国专利报》。作为专利局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这些工作都是由我主持筹办的。

专利工作是一项国际性很强的业务，与国外业界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专利局的建设也受到国外同行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我们除了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

经常性的业务联系以外，还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日本等国的专利局以及欧洲专利局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西德科尔总理政府决定拨两千万马克专款，帮助中国建设专利制度，为中国专利局建立了一个印刷厂，提供了全套通讯设备，接收了几百名审查员和管理人员到德国专利局去培训。日本有关部门也赠送了两套富士通计算机，并派专家组来协助安装，指导使用。其他各国专利局也都承担了为中国专利局培训人才的任务，使中国专利局有了合乎国际标准的人才队伍和硬件设备，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运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成员国大会，每次都由我陪同中国专利局局长前往参加，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参与大会的讨论。

现在，我已届耄耋之年，回顾这一生，我有一点体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都必须下苦功夫，认真钻下去，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几十年中，我坚持凡是写文章、作报告、作演讲，无论是用中文、英文还是俄文，都必须亲自动脑、动手，亲力亲为。要独立思考，绝不让别人操刀代劳。我遵从“活到老，学到老”的教诲，尽量做到与时俱进；70岁开始学电脑，逐步学会了用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打字，打了几百万字材料，速度还不慢；还学会了用中英文上网检索资料。我从68岁学开汽车，一直开到84岁，是一名具有16年驾龄的老司机了。

